

燕舞莺歌迎新年

——我院举办2015年北京医院新春联欢会

2015年2月12日下午,“北京医院2015年新春联欢会”在报告厅举行。院工会主席、副院长汪耀向全院职工致以新年贺辞。院领导、部分处室领导同我院400多名职工齐聚一堂,共同欢度新春佳节到来的美好时光。

联欢会以北楼分会热情欢快的开场舞拉开序幕。随后李铮、李祥、张雷、赵城四位主持人伴随着《小苹果》欢快的旋律以劲歌热舞的方式点燃了所有现场观众的热情。外科分会推出了以宋京海、欧阳小康、张耀南等“大腕”领衔的歌舞《桃花源》,幽默潇洒的台风、极富感染力的表演,掀起了整场联欢会的高潮。由李长平编排、10名护士长为主力的“天使”舞蹈团表演了藏族舞蹈《格桑拉》获得观众连连喝彩。合唱团精心编排的小合唱《爱之声》是一首歌颂医务工作者的歌曲。团员们驾轻就熟、演绎得游刃有余,展现了青年医生的风采。纷至沓来的歌舞表演、吉他弹唱、文章朗诵等节目精彩纷呈,演员们情绪饱满、活力充沛。轻歌曼舞间传递着喜悦的心情,欢声笑语表达着幸福的心声,舞台上上下下连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联欢会伴随着医技分会的合唱《再回首》圆满落幕。

联欢会还抽取了三次工号奖,以表达对坚守岗位职工的慰问。此次联欢会,各分会认真组织、精心排练、倾情演出,为我们奉献了一场欢乐盛宴。

工会



北京医院自解放以来,长期承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预防任务,为高干保健医疗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形成了医院的优良传统,培育了一支优秀的保健队伍,涌现了许多先进模范人物。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北平医院从此获得新生。

1949年2月14日北平医院被军事管制,同年4月25日接管结束,由军委卫生部接管北平医院,院长黄树则,副院长谢华、张庆松。当时接管北平医院的是朱稼院的部分医护人员,朱稼院的医务人员是由延安中央医院和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这两部分人员组成。他们给北平医院带来了延安作风和延安精神。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将北平市改名为北京市,同年10月北平医院改名为北京医院。1950年2月毛泽东主席为北京医院题写了院名“北京医院”,这是全国唯一由毛泽东主席题写的医院。

接管后,北京医院直属中央军委卫生部领导。从那时起,医院的任务除为一般市民看病外,开始承担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医疗任务,部分中央领导同志的治疗就是安排在原德国医院时期建造的老病房三层。北京医院的第一号医疗证持有者为毛泽东主席。当时负责保健医疗工作的是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同志,参加保健医生的有力伯畏、何慧德、韩宗敏等少数几位同志。1952年后我院由承担干部和市民的医疗工作改为专门负责干部及家属的保健医疗工作。

解放后,北京医院的保健医疗任务不断扩大,原有建筑已经不能适应高干保健工作的需要。1949年7月12日医院研究决定新建门诊部。门诊部于1950年5月动工,1951年10月1日落成,由当时任军委卫生部长贺诚题写落成基石,建筑面积为4803平方米,高三层,一层为急诊室、治疗室、脑系科、内科、心电图室、化验室、挂号室、口腔科、耳鼻

院庆特刊

今天 是你的生日

喉科、眼科、外科、西药房;二层为理疗科、光疗室、电疗室、门诊办公室、皮肤科、职工门诊、妇科门诊、中医科、中药房、病案室等;三层为一个能容纳300余人的礼堂。门诊楼于1984年12月拆除,为扩建现在的新楼做准备。

在北京医院承担医疗保健任务一开始,领导就极为重视保健队伍的建设,1949年9月从北大医院调来了张式瑜、樊宝英、刘德丽等三名护士,傅连璋副部长亲自同她们谈话,明确她们的任务就是做专职保健护士,工作方法以出诊、随访、治疗为主。1951年又从上海调来了徐文倩等一批专职保健护士,这些同志来院后,同样是由傅连璋副部长亲自谈话,布置任务,并且决定成立特别护理组,张式瑜任护士长,高云青任副护士长。傅连璋副部长对直接从事保健工作的同志要求极为严格,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要严格遵守作息时间,要求定期召开生活会,坚持保密制度,要求做到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做到不在公共场所及通信中涉及工作问题。要求仪表端庄大方、有礼貌。工作中要做到“三轻”即说话轻、走路轻、取放东西要轻,临床护士则要做到“三勤”即口勤、腿勤、手勤,并要对每个病人做到心中有数,及时处理问题。特别护理组于1953年同老三病房合并,整个老三病房成为最高级的保健医疗病房。刘少奇主席、董必武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均在老三西住院治疗过。同时301医院、

海军医院、中南海保健组以及蒙古共和国都曾先后派来护士到北京医院学习进修。

建国初期是中苏关系全盛时期。1949年10月14日首批苏联专家来我院协助和指导工作,其中有内科、脑系科、外科等医生,队长巴沙林。每1-2年轮换一批,到1959年最后一批撤走,先后共有28位苏联专家到我院工作。当时苏联医院的模式,一些科室的建立如理疗科设立电疗、水疗、泥疗,以及巴甫洛夫学说,对病人实行保护医疗制度,医护人员的着装、探视制度的规定,对我院影响很大,在某些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1952年11月当时在山东济南任省立医院医务主任、山东医学院外科教授兼教务长的计苏华调任我院任副院长,专门分管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医疗工作,他先后担任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此时,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在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亲自过问和关怀下,在傅连璋、黄树则的直接领导下,在计苏华的具体负责下,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层,为进一步做好高级干部的保健医疗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53年4月北京医院由军委卫生部领导改为中央卫生部领导。

北京医院自归属于中央卫生部领导后,医院的任务进一步明确,即北京医院专门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医疗任务。1957年我院领导根据医院承担的任务,成立保健办公室,阮雪华任保健办主任,提出北京医院要以高干保健工作为重点,以老年病为中心的办院方针。并从组织机构作了一系列调整,1958年将小儿科、妇产科调入中苏友谊

医院,将协和医院的泌尿科和内分泌科迁到我院。在此期间,院领导调动比较频繁,相继调齐涛、石济时、邓家栋副院长来院工作,并作了明确分工。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保健医疗工作的领导,1959年院党委提出当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崔田同志兼任北京医院院长,此项建议得到了上级机关的批准。另一方面,为了保健工作的方便,切实发挥北京医院保健基地的作用,做到北京医院的领导能够协调兄弟医院的专家为高干保健医疗服务,1961年8月16日周恩来总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名义签署任命书,任命齐涛、计苏华、邓家栋三位副院长为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周总理的任命对于加强我院医疗保健工作,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医院机构做了相应调整,成立保卫科、人事科、医务部、院办公室、门诊办公室,1959年选举成立第一届党委会,齐涛为党委书记。

1952-1959年从全国各大医学院校如上海医学院、山东医学院等选调优秀力量加强保健队伍。1959年9月选调耿德章、塞继祥等10多名青年医生来院工作,同时相继从四川、上海、湖南等地选调了一批护理人员。1960年陶恒乐教授调入我院。据统计,在1959年到1962年的几年里通过成批医护人员的调入,新毕业的大学生占全院高级技术人员的41.8%,新毕业的中专人员占全院中级技术人员的36.33%,为了提高保健医疗质量,初步开展了科研工作,成立了动物实验室,开展了无痛注射法,抓紧了护士基本功的学习,统一了全院的护理工作操作,制定了北京医院工作暂行条例和各项规章制度。为了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1959年3月在门诊内科专

门建立了一个门诊保健室,专门负责司局以上人员的健康检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同时摸索出一套从体检、确诊、追踪、治疗直到病案管理等被称为“一条龙”的作业线。

为了适应恢复期病人的休养,经我院与卫生部共同选址,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主办,并经周总理批准,在香山公园内的“枫林村”,筹建香山疗养所。1964年11月10日正式开所,1966年8月停办,1979年7月我院将该所全部房产归还给香山公园管理处,医务人员全部撤回医院。

为了给保健人员参加医疗第一线的实践机会,提高保健人员的业务水平,更好地完成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任务,同时召开全院职工大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通过学习领会认为毛主席对北京医院“应当开放”的指示非常正确,一方面北京医院可以扩大服务面,把为高干服务与为普通市民服务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医务人员通过多看病人,多看病种,可以提高医疗诊断水平,从而更好地完成保健医疗任务。在统一思想基础上,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条件,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准备,于1964年10月15日在台基厂二条开设了北京医院第二门诊部

和两个普通病房,接收合同单位23个约8000多名职工的医疗任务。门诊急诊人数骤然上升,1963年全年门诊总数为115992人次,1965年上升到201225人次,1966年猛升到284997人次。1964年底的开放是北京医院从封闭型走向开放型的开始。从以后的实践证明毛主席关于北京医院“应当开放”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是北京医院正确的办院方针,是摆脱专门医生变为不专门医生的唯一途径,是北京医院走向发展的光明大道。但是“文化大革命”给北京医院笼罩了乌云,医疗保健工作受到很大的冲击。

“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医院同全国各地一样,被卷入了动乱之中,北京医院被称为修正主义的温床,“走资派”的避风港,领导干部被戴上了牛鬼蛇神的帽子,专家教授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保健医生和护士受牵连,有的甚至受不白之冤,被关进了牢房,大批医务人员被下放到甘肃靖远县矿区,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共277人,占当时全院职工总数的33.9%,极大地挫伤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医院的规章制度和正常秩序受到严重破坏。根据当时情况,国务院中央军委于1967年3月22日对我院实行军管,先后有三届军管会,1974年军管会撤离。

医疗保健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巨大的冲击,但是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最大的可能抵制着这种冲击。第一、二门诊部在1965年8月合并后,彻底向群众开门,门诊量骤然上升,我院广大医务人员在人员减少情况下,派出20多批国内外医疗队,奔赴边远山区,贫困地区,抗震救灾第一线,为广大患者服务,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和好评。保健办公室于1964年9月撤销后,改名为总值班室,承担着原保健办公室的任务,同时在门诊部增设了一个“会诊室”,承担着高级民主人士的医疗保健任务。老三病房尤其是三楼西,一直为高干病房。

摘自《北京医院院史资料汇编》